

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

——宋金元时期的

《中庸》与道统问题

「德」苏费翔 「美」田浩◎著 肖永明◎译

Cultur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Exploring Issues with the *Zhongyong* and the *Daotong*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元祐天子手蹟
奉同
對夫兄城南了作
仙閣
詩簡連畫卷生香後日吟
想家南湖水秋去幾許涼
東隱
小山出桂叢歲莫落時色
衣落圓庭波能几渺伊邇
詠歸橋
溪隄手撈水來欄跨水橋
舞雪千絲事歷歷至今影
紅窗
秀擊體立臨溪澗水雲你
石不溪洲趣難忘親關心
羅澤堂
堂後林陰密堂前湖水你
感君懷我意千言夢相尋
蘭幽
光風浮碧澗蘭杜日斜
竟歲無人采含羞祇自紅
重樓
吳水一編千不自把上得
石室穿林窺密林出曉
山齋
嚴寺樓上頭讀書樓下屋
襟裁千嘉心俯仰數椽星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

——以余英时与葛兰言为例

陈学远 著

ISBN 7-309-04711-9

余英时文集·第五卷
现代学人与学术

余英时著

陈学远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12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32开 印张：16.5

字数：300千字

定价：35.00元

ISBN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7-309-04711-9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

——宋金元时期的

《中庸》与道统问题

「德」苏费翔 「美」田浩◎著 肖永明◎译

Cultur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Exploring Issues with the *Zhongyong* and the *Daotong*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元睦父子手蹟
奉用
彭大兄城南子作
仙閣
行笥連書卷生窗渡月吟
想象南湖水秋古幾許涼
東浩
小山點桂裝歲莫蕩時色
花影倒金波秋風渺月懸
詠歸橋
涼隄手搖水朱欄跨水橋
舞雲千載事歷歷正夕陽
紅齋
秀髻盤盤在隱溪淒淒水雲涼
白尔溪洲趣難忘親關心
栗澤堂
堂後林陰密堂前湖水涼
感君懷分無千丘夢相尋
蘭幽
光風浮碧涵蘭杜日晴
竟歲無人來含蕊祇自紅
香樓
只此一編香不自知上得
石室穿林訪野泉阮水晴
山齋
藏書樓上頭樓下樓下屋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
(德)苏费翔,(美)田浩著;肖永明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8.5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ISBN 978-7-101-13080-5

I.文… II.①苏…②田…③肖… III.①儒家②《中庸》-研究 IV.B2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2265 号

-
- | | |
|-------|---|
| 书 名 | 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 |
| 著 者 | [德]苏费翔 [美]田 浩 |
| 译 者 | 肖永明 |
| 丛 书 名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
| 责任编辑 | 孟庆媛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4½ 插页 2 字数 326 千字 |
| 印 数 | 1-1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3080-5 |
| 定 价 | 78.00 元 |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第十五种)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邓小南

副 主 编 侯旭东 刘浦江

编 委 (依音序排列):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罗 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吴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 帆(北京大学历史系)

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0年5月

中文版序

我们很高兴,借由中译本的出版,能够与中国读者分享研究心得和相关认识。中国读者是我们最重要的表达对象。我们的著作本来就应该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而不是仅仅面向北美和欧洲的英文读者。我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帮助我们加强与中国学者及知识群体之间的联系,让现在或将来的中国读者在进行有关历史、哲学、道德、文化和权力的对话时注意到这本书。

我们两位作者中,田浩较为年长。自 1983 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论文后,田浩就非常重视以中文出版作品。90 年代以来,不断有新作问世,并编辑了系列丛书。苏费翔则年富力强,自 2006 年开始出版中文作品,并持续至今。

我们是“老外”,是“后学”,所以毋庸置疑,我们非常期待从中国朋友和读者那儿听到批评和反馈的声音。我们把这些对话视为从中国学者那儿获得教益的机会。这些反馈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或是为某些我们很自信的观点提供更有力的论据,使之得到更充分的阐述。

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旁观者的视角”也能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观点供其参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来自异质文化或文明的观点,

有助于拓宽自己的视野。美国人、欧洲人、中国人都易于将自身的历史与文明进程视为天然合理、合乎逻辑而又具有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旁观者的视角”就显得尤其重要。以新的眼光来观察不同的历史如何形成,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如何思考,不仅会增进我们对其他文化的认识,也会加深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目前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流行的做法是,要么将自身历史文化视为例外的、独特的,要么将其理解为普遍的、通用的。阅读采用“内”、“外”两种不同视角来书写的历史著作,也许能够避免上述两个极端。

我们也可能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并学会从多种视角出发寻求因应之道,以解决我们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所共同面临的一系列道德、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其他问题。许多重要的挑战,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健康问题,已经超越国家和文化的畛域,需要我们加强全球范围的合作来应对。通过更深入地理解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了解其他文化中的人们对他们自身和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合作就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希望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能为这些重大的问题和宏大的目标略尽绵薄之力。

我们这部书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国际对话中的一部分。自2012年本书英文版问世以来,已有其他学者加入到“道学群体的传统”的研究中来,特别是有关朱熹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新的进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译本中我们不能对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新发现加以吸收或讨论,但我们仍希望我们的分析对中国学者具有重要的价值。

本书中译本的问世,得益于许多人的辛勤劳动。其中,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无疑付出了最多的心血与努力。当肖教授表达翻译这部书的意向后,我们既感到惊喜,又心存感激。然而翻译之繁难超出预料。我们要向肖教授致以特别的谢意,在翻译英文原文之外,他还校对了引文注释中涉及的中文原始文献及外文二手文献。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特别是涉及某些术语时),中译者和审校者还进行了补充研究。译者一丝不苟,努力做到忠实于原文。显然,这部中译本是成功的跨国合作的结果。我们两

位原作者对中译本进行了审读,愿意对文中出现的任何错误负责。

回想起本书中译本问世过程中碰到的诸多困难,肖永明教授为这一项目以及国际学术交流所做出的贡献,更让我们深怀谢意。同时,对他参与此事的同事以及学生们,我们也表示由衷的感谢。他的一位学生蒋明参加了2017年5月在柏林自由大学举办的“东亚儒家书院研讨会”,田浩在那里与他讨论了某些脚注的格式处理问题。

本书的核心部分由苏费翔完成。2002年,苏费翔受洪堡基金会资助来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开始用英文撰写本书的几个章节。在那一段时间里,苏费翔与田浩之间的切磋、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交流一直延续到今天。苏费翔于2004年回到德国,并完成初稿,而书稿直到2012年付梓前还在做进一步的修改。

附录所收录的苏费翔的三篇论文与原书的论题部分重合,但要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要么聚焦其中某一个关键的论点。同时,这些论文都与“道学群体研究”的最新动向有密切联系。特别要提到的是,这几篇论文都是在中国的研究机构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中与学界同仁进行交流的产物。这些论文原本是用中文撰写的,根据编者建议收入本书。

田浩于2003—2004学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来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04年夏秋又得到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资助。正是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本书部分章节的初稿。他将北京大学视为自己在中国的第一个学术家园,在北京大学期间撰写的一篇长文,最终成了本书的第四、五章。田浩这篇长文是用中文撰写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臧健教授热心地进行了修改。本书英文版的致谢部分表达了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同事们以及他们在赤峰举办的那次国际会议的谢意,正是在那次会议上,田浩提交了他的中文论文。后来田浩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在台湾大学从事为期一学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第六章的内容是在2009年完成的。在英文版的致谢部分,田浩也表达了对台湾大学同仁们的谢忱。

邓小南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杜乐曾于2010年秋季学期上过田浩在北京大

学的课程,后来对中译本第四、五章提出了某些补充建议。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张晓宇曾是田浩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指导的博士,他提供了第六章的中文翻译初稿。肖教授在最终完成这部面向更广泛中国读者的译著中,有些地方参考了他们的建议和译文。

附录中田浩的五篇文章的首篇是为一场特别的研讨会而作的。在那场研讨会中,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的汉学家济济一堂,而田浩在文章中回顾了他的中国研究历程。这篇文章方便读者们了解田浩在中国史领域思考和耕耘的历程。另一篇文章本来是为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而撰写的,主要阐释了田浩研究“道学”的进路,并回应了某些对他作品的批评。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则是他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从事金史研究时写成的。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位先生遵循传统的观点,认为金朝没有道学活动,并对田浩研究金朝儒学的想法持有不同看法。而田浩坚持研究金朝史料,并从中发现了可靠的证据,证明女真统治之下的北方道学自有其发展的轨迹。文章译成中文后,邓广铭教授称田浩填补了一项为国内中国史学者所忽视的重要空白,论文发表后中国学者会更加关注金朝儒学,从而发掘出更多史料。后来,田浩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广为流传,金元儒学研究受到学者们重视,邓教授的预言成为现实。因此,虽然这两篇文章从80年代末以来就已经被超越,但编者考虑到它们在金朝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或转折点的意义,仍然决定将它们收录进来。另外,这两篇文章还补充了一些细节和背景,而这些内容在本书正文中仅仅简略叙及。最后一篇文章最早发表于北京大学,主要探讨蒙古军队的征服与汉人的回应,它也可以为田浩在本书正文中对郝经的论述提供一些背景方面的补充。这五篇文章,是田浩历年来和多位朋友共同翻译的。

1)《我与中国研究的不解之缘》,刘倩原译,《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北京大学)第十期(2014年12月),页291—306。

2)《朱熹与道学的发展转变》,田浩、段志丹、刘倩、刘后滨原译,收入吴震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9年),页10—23。

3)《金朝思想与政制概说》,田浩与俞宗宪原译,出版时田浩将俞宗宪当作第二著作者,收入衣川强(Kinugawa Tsuyoshi)主编《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舍(Dōhōsha),1989年],页29—42。

4)《金代的儒教——道学在北部中国的印迹》,黄振华原译,《中国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十四期(1988年),页107—140。

5)《因“乱”而导致的心理创伤:汉族士人对蒙古军人入侵回应之研究》,田浩与姜长苏原译,《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第十期(2004年),页69—91。

田浩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同事刘倩以及两位于2017年到访的学者刘玉敏与任仁仁帮他进行了编辑和审阅。

我们也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教授以及中心的邓小南教授,他们慨允将本书列入中心组织出版的丛书。这部书得以成功出版,还得益于中华书局编辑孟庆媛女士的积极推动。以上这些学者及两个单位的指导与帮助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对此我们铭感于心。

田 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中国史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04年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客座教授(2011—2016年)

2017年9月4日于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苏费翔(Christian Robert Soffel)

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教授

2017年9月13日于特里尔

序言一

本书的撰作,得益于多方的帮助。对于相关的机构,我要特别感谢洪堡基金。他们多次慷慨的资助,在许多方面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让我得以有几次机会与特别令本人感激的田浩(Hoyt Tillman)教授一道工作。第一次见到田浩教授是在2000年。当时,他获得洪堡研究奖,在慕尼黑大学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结识田浩教授促使我进一步研究宋代学术,由此我们共同撰写了这本书,又进行其他一些项目。田浩教授不仅是我的指导者和同事,也是好朋友。2002到2004年,洪堡基金又继续资助本人,接受田浩教授的邀请,前往位于美国坦佩市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从事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这两年的研究奠定了我对《中庸》进行分析的基础,相关的研究内容就是本书的前三章。非常感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诸位教师和管理人员,是他们使得我在该校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如果没有慕尼黑大学普塔克(Roderich Ptak)教授、叶翰(Hans van Ess)教授以及贺东励(Thomas O. Höllmann)教授不断的帮助,我不会取得现在的进展。他们不仅积极推荐我经常出国从事研究,还总是在我需要生活或学术指导时充当我的良师益友。

林庆彰教授在现代社会推进经学研究的热情,值得全球学术共同体永久感激。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他邀请我参加 2002 年的宋代经学国际研讨会,并让我在 2007 到 2008 年在台北“中研院”文哲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在文哲所与李明辉先生进行了大量关于宋代儒学史的讨论,此外,与杨晋龙、蔡长林、蒋秋华先生的讨论也大大丰富了我对 12 世纪儒学传统的理解。非常感谢“中研院”的博士后项目。

还要向王安国(Jeffrey Riegel)教授表达我的谢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他使我对他早期著名的《中庸》研究著作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让我得到了他尚未出版的学位论文的复印件。

汉堡大学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教授在如何进一步加强本论题的研究方面为我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在此深表感激。

在海德堡和卢布尔雅那的会议论文发表过程中,成中英教授、闵道安(Achim Mittag)先生和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先生都做出了有价值的评议。

我还要对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同事们致以谢忱。尤其是在 2004 年,他们邀请我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提供机会,让我参观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遗迹。

就在本书的初稿即将完成之际,台北的政治大学陈逢源为我提供了他研究北宋道统思想的重要论文。他的慷慨之举,令人感激。

本书的撰作,大大得益于贝克定(Timothy Baker, Jr.)教授和林素芬教授的帮助。贝克定教授在书稿付梓之前对手稿进行了细致的审阅,林素芬教授与我在各种不同场合讨论道统问题,在我初稿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些注释。

在研究过程中,众多的友人们在学术方面或个人生活方面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因为人数太多,我不能在此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内心的感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可能有人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但我还是要对中国数百年来前贤往哲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正是他们留下的大量珍贵的著作,启迪了我们的

智慧。

当然,我要向我的妻子高琼铃女士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虽然我不时感到有点茫然,又经常外出开会或进行研究,但她总能找到机会,用她的微笑、超常的耐心和理解力让我振作起来。本书由我撰写的部分,就是献给她的。

谢谢大家!

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

2011年6月于慕尼黑大学

序言二

我对郝经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得到了富尔布赖特基金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蒋经国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对郝经的研究是我对宋、金、元时期道学演进研究计划的主要内容。我的郝经研究论文,一部分是用中文撰写的,并于2004年8月在内蒙古赤峰的会议上发表。很感谢与会者对论文的评议,尤其是我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同事张希清、臧建、刘浦江,还有来自台北“中研院”的朋友黄宽重,来自东吴大学、台南成功大学的刘静贞,来自慕尼黑的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都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建议。田梅(Margaret Mih Tillman)和奚如谷(Stephen H. West)后来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中文版在会议论文集中发表。^①在经过大量进一步修订完善之后,中文版成为本书第二部分第四章、第五章的基础。

第六章的初稿是在2009年春季学期于台湾大学担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客座讲席教授期间完成的。在那里,我与同事们讨论文章并接受他们的批评,这一机会使我获益匪浅。与中文系郑吉雄教授、夏长朴教授和历史系

^①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碰撞与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硕士生童永昌、中文系博士生陈盈瑞的交流尤其大有裨益。“中研院”文哲所林庆彰教授、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黄俊杰院长为论文初稿的发表提供了机会。2010年,得到美国教育部的富布赖特—海斯海外研究项目资助,因此有可能将本章的一部分加以修改后,递交给当年5月于香港浸会大学举行的经典研讨会。我的初稿以及递交的论文获得了许多同事和匿名读者的评论,因为涉及者甚众,在此不一一提及。

在2011年春末和夏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座教授,并在杭州师范大学担任国际宋代研究中心主任,因此有机会与中国的同行们商讨,对原稿加以修订。非常感谢人民大学历史系刘后滨主任、包伟民教授以及参加每周举行的讨论小组的本科生与教师们。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讲授历史文献学课程时的本科生(尤其是Christine Luk)和访问学者也对初稿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近些年来,我任职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给予了我两次学术休假。我还特别感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人文学院院长Deborah Losse的帮助下)允许我在第三学期离校,使我有机会接受国家基金资助,在本项目和其他项目研究过程中开展国际性的研究。

这些项目还带来了另外的好处——我有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与儿子田亮(Hoyt Langston)及其家庭待在台北,与女儿田梅(Margaret)待在台北、上海和北京。我应当对他们,尤其是我的妻子宓联卿(Tina)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们的鼓励,让我度过了这么多快乐的时光;在我沉迷于“与古人对话”的时候,是他们把我拉回了现实之中。我以感恩之心,将我撰写的这些文字献给宓联卿,感谢她四十多年来的爱与陪伴。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来自洪堡基金、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文研究所及该所所长Sally L. Kitch教授的资助。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一直延续到著作的出版,对此我心怀感激。

我与苏费翔合作与讨论的成果,除了目前的这本书之外,还包括一系列友好而激发灵感的交流。这种交流让我们改变了某些观点,增进了我们对

这一历史时期相关史料和历史过程的了解。例如,早在 2003 年,他就对朱熹最早提出“道统”一词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为此使用计算机检索,以搜寻唐宋时期最早使用该词的事例,并最终形成了本书的一个核心的主题。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的理解。

田浩(Hoyt Tillman)

2011 年 7 月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